

现代政治经济学

前·沿·译·丛

The Demand and Supply of Public Goods



公共物品的 需求与供给

James M. Buchanan

[美] 詹姆斯·M. 布坎南——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马珺——译

非
外
借

现代政治经济学

前·沿·译·丛

The Demand and Supply of Public Goods



公共物品的 需求与供给

**James M.
Buchanan**

[美] 詹姆斯·M. 布坎南——著

马珺——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公共物品的需求与供给/(美)詹姆斯·M. 布坎南
(James M. Buchanan)著;马珺译. —2版.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现代政治经济学前沿译丛)

书名原文:The Demand and Supply of Public
Goods

ISBN 978-7-208-14648-8

I.①公… II.①詹… ②马… III.①公共经济学-
研究 IV.①F06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74889 号

责任编辑 刘林心

封扉设计 人马艺术设计·储平

公共物品的需求与供给

[美]詹姆斯·M.布坎南 著

马珺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3.25 插页 4 字数 170,000

2017 年 8 月第 2 版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4648-8/F·2467

定价 42.00 元

前 言

继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十五年里,“公共支出理论”的兴起无疑是公共经济学最重大的发展。围绕“市场失灵”的观念,这一发展试图定义一个全面的国家理论。此前,公共经济学的分析一直集中于预算的税收一方,其中心要务就是如何“最好”地筹集公共活动所需的收入,对于那些公共活动的基本原理,却全然缺乏经济分析,因此,将其大部分内容称之为“公共财务”并无不妥。这一背景凸显了公共经济学中公共支出理论兴起的重要性。可以肯定,那时也存在着关于公共活动之基本经济原理的零散说辞,例如庇古(A. C. Pigou)对“排烟工厂”问题的著名解释。然而直到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在一系列关于“公共物品”的著名文章中,为政府对经济过程的干预建立起内在连贯的综合辩护之前,这些说辞都显得片面和偏颇。萨缪尔森提供了一种后来被詹姆斯·M. 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称之为“生产性国家”(productive state)*的理论。在他的表述中,市场失灵是为政府干

* Paul A. Samuelson, "The Pure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36(November 1954): 387-389; "Diagrammatic Exposition of a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37(November 1955): 350-356; 以及"Aspects of Public Expenditure Theorie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40(November 1958): 332-338. James M. Buchanan, *The Limits of Liberty: Between Anarchy and Leviatha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5),《布坎南选集》第7卷。

预辩护的关键因素,公共物品的存在可以看作是市场失灵的极端形式。原则上,那些组成相应的集团(或者政治体、国家)的公民,通过市场能够获得一切可能的得自交易的收益。然而公共物品的存在阻止了这一交易利益的实现,在这个意义上,公共物品成为各种可能的市场障碍的集中体现。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见证了市场规范分析的萌芽,它们大多以表现市场失灵为目标,因此常常被理解为某些政府干预形式的公认理由。

现在流传着一种看法,据说公共物品规范分析的要点是导致公共选择运动产生的重要因素。公共选择学者的一个核心抱负即是,坚持讨论中的市场失灵足以支持优先选择政府活动之前,有必要证明“政治的成功”——并证明,这一政治成功可能比公共经济学假定所暗示的更难取得。换句话说,经济学家据以判定市场失灵的基准,仅仅是对于市场在另一个(私人物品)领域运行的想象。市场失灵本身什么也不能说明;政治活动本应服从同样的检验。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布坎南的著作在这方面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然而,公共选择传统从未否认市场失灵论点的逻辑,指出这一点很重要。确实,布坎南本人在市场失灵-公共物品文献方面做出过极其重要的贡献。例如,几乎可以说是布坎南两篇最著名的论文——与W. C. 斯塔布尔宾(W. C. Stubblebine)合著的《外部性》以及《俱乐部的经济理论》,刚好均属于这一论题。实际上,公共物品理论构成布坎南整个20世纪60年代主要(也许是最重要)的研究领域。《公共物品的需求与供给》是这一工作的重要构成部分,它与《布坎南选集》第15卷《外部性与公共支出理论》一起集中反映了布坎南在公共物品问题上的观点,应同时阅读。此外,本书还应与萨缪尔森的早期贡献以及理查德·A. 马斯格雷夫(Richard A. Musgrave)的文章同时阅读。约翰·G. 黑德(John G. Head)提供了一个与本书同时代的相关文献综述,其中包含一篇篇幅与论文相当的对

布坎南著作的评论。*

尤为饶有趣味的是,对比布坎南与早前萨缪尔森的方法,有两点区别相当明显。首先,萨缪尔森的核心意图是建立公共物品供给的“最优条件”,从而表明帕累托最优永远不可能是市场均衡的结果,而布坎南则直接寻求达到市场均衡的方法。考虑到布坎南的更广泛的目的,即直接对比市场机制和政治机制各自的表现,这样做是必须的:布坎南对于概念上可能而制度上不可行的理想状态兴趣不大。第二,与此相关的是,布坎南的大部分著述读来颇像关于制度选择的纯实证文献。通过交换追求共同利益——无论是关于普通私人物品的二人交换,还是关于公共物品的多人交换——在《公共物品的需求与供给》这本书中,既被作为对交易进行检验的规范标准,同时又表明了人们行为的动因。因此,本书是布坎南有关“生产性国家”的契约理论的一部重要作品,在契约方法的运用上,故意模糊规范方法与实证方法之间的区分,使得作者可以自由充分发挥自己的观点。**布坎南的理论与萨缪尔森更明显的规范方法(虽然并不全是这样,萨缪尔森的方法也有其实证性的一面)以及独立发展出来的“社会福利函数”,形成鲜明的对照,这一点值得注意。后者明确表达了“有道德的观察者眼里的最优”标准,在这方面,布坎南比萨缪尔森更忠实于威克塞尔方法,尽管二人解决公共物品问题的理论最终都来自于威克塞尔传统的知识资源。埃里克·林达尔(Erik Lindahl)曾对威克塞尔方法有过论述,在此基础上马斯格雷夫又

* James M. Buchanan and W. C. Stubblebine, "Externality," *Economica* 29 (November 1962): 371-384; James M. Buchanan, "An Economic Theory of Clubs," *Economica* 32 (February 1965): 1-14. 这两篇论文均收入《布坎南选集》第15卷《外部性与公共支出理论》中。James M. Buchanan, *The Demand and Supply of Public Goods* (Chicago: Rand-McNally, 1968), 《布坎南选集》第5卷。Samuelson, "The Pure Theory," 387-389; "Diagrammatic Exposition," 350-356; and "Expenditure Theories," 332-338; Richard A. Musgrave, *The Theory of Public Finance* (New York: McGraw-Hill, 1959). John G. Head, *Public Goods and Public Welfare*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74).

** Buchanan, *Limits of Liberty*, 1975, 《布坎南选集》第7卷。

依据林达尔的论述重新解读威克塞尔,就萨缪尔森而言,他是通过马斯格雷夫解读林达尔版本的威克塞尔方法而间接承接克努特·威克塞尔(Knut Wicksell)传统的。*

值得强调的是,威克塞尔的原创性贡献中同时包含两个研究方向
的共同起源,一是通向政治学的公共选择,二是与之并列的关于公共物
品和市场失灵的理论。由于布坎南受威克塞尔的影响更明显,因此,他
能够同时在上述两个领域做出独立的贡献,并作为两个领域相互关联、
不可分割这一思想的坚定支持者,丝毫不令人吃惊。

《公共物品的需求与供给》一书初稿形成于1961—1962年于剑桥
大学的系列讲座期间。因此,最初设想的读者是能力相对较强的本科
生以及研究生。但是,在这里看不到任何教科书的影子——没有干巴
巴的说教,也没有特别考虑到本科生关注的重点范围。布坎南在此提
供的,是(相当大程度上按照威克塞尔和林达尔的“自愿交换”传统)对
有关公共物品问题的契约方法的清晰表述。

杰弗里·布伦南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1998年

* Richard A. Musgrave, "The Voluntary Exchange Theory of Public Econom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53 (February 1939): 213-237; Erik Lindahl, *Die Gerechtigkeit der Besteuerung* (Lund: Gleerupska Universitets-Bokhandeln, 1919); Knut Wicksell, *Finanztheoretische Untersuchungen* (Jena: Fischer, 1896).

作 者 序

本书选择以“公共物品的需求与供给”作为标题,是为了突出与正统财政学(orthodox public finance)的不同之处,同时,也是为了与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建立起关联。传统上,财政学既不包含公共物品与服务的需求理论,也不涉及相关的供给理论。公共物品与服务不是这一分支学科的重心所在。价格理论已在财政学中得到了相当直接的应用,但其科学成分仅限于推测个人和企业对于财政制度的反应。一位来自外部空间的学者,如果在后马歇尔时代光临地球,当他熟读财政学英文文献之后,也有可能得出如下结论,即政府完全外在于其公民而存在,它们向个人和企业征税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使国家更富有;他也有可能认为,实证财政学就是要推测税收的效应,规范财政学(尽管其中不乏实证因素)则旨在就应当如何征税提供意见。

马歇尔经济学(Marshallian economics)主要是关于私人物品供求及其交易组织(即市场)的理论。传统财政学借鉴马歇尔经济学中的效用主义来发展自身,却只承袭了效用主义谬论中国家干预的理念。早期的欧洲大陆学者,曾尝试将经济理论不仅应用到私人物品领域,还应用到公共物品领域,然而,英语世界学者囿于语言所限,对此一无所知。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萨克斯(Sax)、潘塔莱奥尼(Pantaleoni)、德维蒂·德马科(de Viti de Marco)、马佐拉(Mazzola)、埃里克·林达尔(Erik Lindahl)等人,最重要的是,克努特·威克塞尔(Knut Wicksell)

等人的思想,在英美著作中几乎完全被忽视。

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里,在 R. A. 马斯格雷夫(R. A. Musgrave)、霍华德·鲍温(Howard Bowen)、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J. G. 黑德(J. G. Head)以及其他人的努力下,这一缺陷得到一定程度的弥补。借助于 19 世纪晚期欧洲大陆学者的努力,公共物品和服务需求与供给的理论诞生了。现在这一理论(特别是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以来写就的)正开始在初级财政学教科书中取得一席之地,然而对其独立、系统的阐释尚未问世,这成为本书写作的动因。

无需在此自称这是一本正统的初级教科书,即使分析的难度没有增加,但也必然存在不同之处。一定程度的复杂经济分析是必要的,熟悉理论福利经济学将会很有用。在可能的地方我已试着阐述得仔细一些。我不能说这是一个新理论,但我本人的见解和理论结构的安排,不同于这一领域的其他学者。就此而言,这一理论是我所独有的,我不做任何方法论客观主义(methodological objectivity)立场的尝试。我也决不声称,本书没有任何分析上的错误。公共物品的需求与供给理论尚未被广为接受,因此它仍然令人充满兴趣,出于同样的原因,理论家也有出错的可能。

1957—1968 年间我在弗吉尼亚大学为二年级研究生开设研讨班,本书即以研讨班上的讲课内容为蓝本。每年我都对讲义进行修订,希望能够不断完善。在这期间,我的 1961—1962 学年是在剑桥大学度过的,这本书的原稿最初写成于 1961 年秋季,那时我正在剑桥大学主持一个为期八讲的讲座。呈现在这里的版本,实际上完成于 1964—1965 和 1965—1966 学年度,以及 1966 年的夏天。及至书稿最终改定,则已经到了 1966 年和 1967 两年之交了。

应当感谢参加了我的研讨班的研究生,在那期间围绕指定的阅读主题,我要求他们每周完成一篇论文,其中常常涉及繁琐的分析细节,显然给他们增加了压力,这些论文成为本书的基本分析素材。十年来研讨班上的学生尤其应当提及的有托马斯·博彻丁(Thomas

Borcherding)、奥托·A. 戴维斯(Otto A. Davis)、埃米利奥·贾尔迪纳(Emilio Giardina)、查尔斯·戈茨(Charles Goetz)、马克·波利(Mark Pauly)、查尔斯·普洛特(Charles Plott)、克雷格·斯塔布尔宾(Craig Stubblebine)和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即使在毕业之后,他们还几乎都对本书初稿的全文作了建设性的评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J. G. 黑德(J. G. Head)、佛罗里达大学的米尔顿·卡夫格利斯(Milton Kafoglis)、杜克大学的戴维·戴维斯(David Davies),以及赖斯大学的戈登·图洛克(Gordon Tullock)都在不同阶段提出了很有帮助的修改意见。蒂伯·西托夫斯基(Tibor Scitovsky)不仅提出具体且有益的修改建议,还鼓励将这本书付梓出版。20世纪60年代所有参加过在劳斯楼(Rouss Hall)举办的学术活动的人员,尤其是我,都要感谢贝蒂·蒂尔曼(Betty Tillman)女士,感谢她的理由不仅仅是因为她通常承担的秘书工作。1966年夏天我得到了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资助。萨拉塔·甘格利(Subrata Ganguly)在编录索引方面提供了帮助,亦在此致谢。

詹姆斯·M. 布坎南

1967年2月于夏洛茨维尔

目 录

1	前言
1	作者序
1	第一章 方法论导论
4	公共经济理论
10	第二章 同质个人间的简单交换
10	独立调整
13	交易均衡
17	交易均衡的代数表达
20	马歇尔几何解释
25	参考文献附录
28	第三章 异质个人间的简单交换
30	公共物品的边际价格差异
31	消费单位与生产单位
32	马歇尔联合供给理论
35	边际价格、平均价格和人际价格歧视
37	公共物品的个人需求
41	边际价格不变与均衡确定性的复归
44	参考文献附录
47	第四章 纯公共物品和非纯公共物品
48	作为公共物品的私人物品

- 49 联合供给单位
- 50 供给单位的固定比例构成——相同数量
- 53 消费构成组合——公共物品的技术特征
- 54 消费构成组合的均衡
- 55 纯公共物品的消费构成组合:消费构成——对等的极端情形
- 57 纯公共物品的消费构成组合:固定比例
- 57 可变比例下的消费构成组合
- 61 消费外部经济:不含正统的联合供给效率的“公共性”
- 67 形式化的总结
- 69 参考文献附录

72 第五章 多人—多种私人物品 ——“搭便车者”问题

- 72 私人物品由一种增加到 N 种
- 73 由一种到多种公共物品
- 73 由两人到多人
- 75 完全竞争
- 76 N 人参与的单一公共物品“交易”
- 78 严格意义上的策略行为——小规模群体的情形
- 79 普遍依赖性——大规模群体的情形
- 81 公共物品供给与“搭便车者”
- 82 搭便车者的选择:概率解释
- 85 威克塞尔的一致同意规则
- 88 一致同意规则与帕累托最优
- 90 一致同意规则与现实世界中的制度

90 参考文献附录

94 第六章 多人—多种公共物品

——不存在计价物品的情形

95 两人—一种公共物品

96 多人—一种公共物品

97 两人—两种公共物品

102 三人—一种公共物品

103 三人—两种公共物品

107 选票交易和偏好强度

111 多人—两种公共物品

113 多人—多种公共物品

115 参考文献附录

117 第七章 政治决策的公共性

117 引言

119 税收分担方案的一般特征

121 简化的二人模型

125 扩展到三人模型

134 公共物品与私人决策

136 参考文献附录

139 第八章 财政选择的制度

139 引言

140 重复选择

141 集体决策的成本

142 达成集体决策的规则

145	财政选择的特定规则
150	政治决策规则与财政规则之间的替代
152	传统税收“原则”的复兴?
154	小结
155	参考文献附录
157	第九章 何种物品应当是公共的
158	问题的表述
158	可分性谱系
159	公共性的范围
160	简要的物品分类
162	政治集团的规模与产权结构
163	组织的功能
164	纯分配模型
167	配置与融资
170	公共供给与公共生产
171	小结
172	参考文献附录
176	第十章 走向实证财政理论
176	引言
178	公共物品的规范理论
181	公共物品供给的实证理论
185	小结
187	补充阅读材料
191	译后记

第一章 方法论导论

人们观察到有些物品和服务是通过市场制度实现需求与供给的,而另一些物品与服务则通过政治制度实现需求与供给,前者被称为私人物品,后者则称为公共物品。

新古典经济学提供了一套私人物品需求与供给的理论。然而,“理论”在这里意味着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最好的方式是考察一下借助于理论我们能做的事情。与在任何其他地方一样,解释(explanation)乃是理论的首要功能。就私人物品而言,借助于经济理论我们可以回答下述常见的问题:应该生产何种物品与服务?资源应如何配置以实现生产?最终产品与服务应如何分配?不过请注意,这里的私人物品经济理论并未提供用于具体预测(specific forecasts)的基础,而是使我们能够对制度结构或决策过程之内在逻辑结构进行解释。有了它,我们得以理解和解释这些决策是如何作出的,而非何种特定类型的结果被具体选中。

解释的过程包含若干步骤。首先设定一组猜想性推测(conjectural predictions),即一组基本的行为假说(behavioral hypotheses)或法则。这些推测可能纯粹基于猜想,需要作出一系列“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何如何”这样的逻辑推理。有的时候,人们设定的假说可能包含经验上可检验的内容,一旦正确地汇集了数据,就能举出证实或证伪这些假说的证据。近年来,经济理论中这一严格的实证内容,可能已经被强调得有些过分了。与之相比,经济理论的更基本的功能,即通过建立推论性推测(inferential predictions),从而理解经济的逻辑结构,则相对受到了忽略。训练有素的经济学者,可以推测出经济结构的一般特点或模式,后者生成于交易或市场过程之中。这些推测不属于“若A成立,则

B成立”这一类条件性推测(conditional predictions),至少与这类推测没有任何直接类似的地方。相反,这些一般推测取如下形式,“A倾向于与B相等”。基本的条件性推测与推论性推测同属于经济理论的核心内容,也许是由于这一点,人们尚未充分认识到二者之间的区别。

条件性推测的形式如下:若价格下降,则需求量增加;若价格提高,则供给量增加。所有这些条件性推测,无论可否在经验上得到证实,它们结合起来共同形成了整个行为互动体系——我们称之为经济——的逻辑解释系统。只要此一背景下的条件性推测站得住脚,我们就可以推论出那些可能产生的结果的一般特征。这些结论仍然属于推测,并且主要是描述性的(descriptive)*。它们给出了各个变量间相互关系的信息:价格会与成本趋同;同等条件工人的工资率将趋于相等;投入生产要素将获得边际产品作为回报。

只是,在上述图景中,条件性推测与推论性推测之间逻辑链条的重要一环被故意忽略了。假定经济学家的条件假说有效,那就是说,条件假说正确地推测到了经济主体在一定条件下的行为反应。当价格下降时,个人将更多地购买;当价格上升时,企业将供给更多商品;等等。然而,在引入作为个人选择背景的制度—组织结构(the institutional-organizational structure)之前,并且除非对这一制度结构作出假定,我们不可能从条件性推测直接得出“价格与成本将会趋于相等”的判断。在这一点上,正统(私人物品经济学的)推论过程已经或明或暗地假定了竞争性制度结构的存在。一旦加入这缺失的一环,就能够从一组条件假说中符合逻辑地得出有关结果的推论,并且刻画出这些结果的描述性特征。

这些特征最精致的表达形式,通常被作为效率或最优结果的边际

* 本书多次用到“descriptive”一词。根据上下文,在本书中的译法略有区别。在这里译为“描述性的”,是指这些推测只是对于市场运行结果的客观描述,不含任何主观判断或评价色彩。——译者注

必要条件而提出,被认为属于理论福利经济学领域。给定竞争性的组织结构这一制度假设,注意到以下这一点很重要,即这些最优条件只是推论性推测,并且其内容是实证性的。作为市场互动过程之结果的描述性特征的推测,从理论上讲,这些条件是可被证伪的。无需赋予它们任何规范含义。

这一逻辑过程的薄弱环节在于它必须对制度—组织结构所作出的假设。仅当该制度假设实际上被满足的情况下,关于市场互动过程之结果的推论才可被证实。举例来说,一位经济学家要推测 1965 年消费税削减对特定行业的影响。假定他推测价格将有一定的下降,我们要说,这一推测被事实证伪了。这是否推翻了企业是利润最大化者这一隐含的条件假设呢,或者,是否推翻了竞争性行业结构的假设?很清楚,如果考虑到其他相关变量的变化,可能其中的一个假设会被推翻,也可能一个也推翻不了。出于方便而假定竞争性秩序的正统经济学逻辑是不可接受的。在推测性解释的意义上,全面的分析应当包含对制度结构本身的考察。经济学家不应满足于假设一种制度模式,并在这一模式下从事研究。他还应从作为其研究起点的一系列基本行为假设出发,研究那些制度结构本身的起源。如此一来,真正的制度经济学成为基础经济理论(fundamental economic theory)的一个重要而有意义的组成部分。

如果将人类交往活动限于最宽泛意义上的自愿交换,从中便可以引申出制度结构的理论作为结果或均衡的产物,这一制度结构与正统的竞争性秩序模式极其相近。换句话说,可以推测,一种不是那么严格的竞争性经济结构能够从人类交往博弈中产生出来,只要这种交往是自愿的。无须使用任何超出正统理论之外的工具,经济学家便能推测出:第一,这一竞争性结构的出现;以及第二,这一制度模式可能产生的结果具备哪些特征。

仅当这一步骤实现之后,经济学家才能够开始谈论竞争——作为一种组织结构——与效率之间的关系。不能引入任何源自外部的标